

衣若芬 著

赤壁漫游與西園雅集

——蘇軾研究論集



綫裝書

宋代文化研究叢書

赤壁漫游與西園雅集

衣若芬 著

綫裝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赤壁漫游與西園雅集/衣若芬著. —北京: 線裝書局,
2001. 7

ISBN 7—80106—079—2/K·7

I. 赤... II. 衣... III. 中國—古代史—史料—考證
—北宋 IV. K224. 0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1)第 034742 號

書 名：赤壁漫游與西園雅集——蘇軾研究論集

著作責任者：衣若芬 著

責任編輯：任夢強

特約編輯：郭 齊

封面設計：王蓉貴

標準書號：ISBN 7—80106—079—2/K·7

出版者：線裝書局

地址：北京市朝陽區春秀路太平莊 10 號 100027

排版者：四川文瀾電子出版制作中心

印刷者：四川省計劃生育宣傳教育中心彩印廠

850 毫米×1168 毫米 大 32 開本 10.0625 印張 180 千字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1000 冊

定價：48.00 圓

目 錄

自序	1
談蘇軾〈後赤壁賦〉中所夢道士人數之間問題	5
歐陽修〈六一居士傳〉與蘇軾〈書六一居士傳後〉	26
一樁歷史的公案——“西園雅集”	49
宋代題畫詩的創作現象與書寫特質 ——以蘇轍〈韓幹三馬〉及東坡等人之次韻詩為例	96
《宣和畫譜》與蘇軾繪畫思想	116
蘇軾書畫研究史略	156
近五十年（1949—1999）臺港蘇軾研究概述	199
附錄	
臺港蘇軾研究論著目錄（1949—1999）	223

自序

本書收錄筆者近年來研究蘇軾的七篇論文，由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曾棗莊教授為之命名曰：《赤壁漫游與西園雅集——蘇軾研究論集》，既扣合本書所包括的兩篇分別討論蘇軾〈後赤壁賦〉與“西園雅集”的論文，“赤壁漫游”與“西園雅集”也是東坡頗為後世傳唱的風流盛事，後人或形諸文字，或表現於書畫，宗仰之情溢於言表。“赤壁漫游”與“西園雅集”甚而揚名海外，日本文人的“壽蘇會”，韓國文人仿赤壁之游與韓國畫家所作的“西園雅集圖”，皆為膾炙人口的東坡事蹟留存連篇佳話，因此以“赤壁漫游”與“西園雅集”為論文之題目應當十分得宜。

筆者研究東坡，主要集中於題畫文學、文藝思想和作品新論三方面，前者已撰成《蘇軾題畫文學研究》一書（由臺灣文津出版社出版，1999年），後二者則見於本書，本書在撰寫方向和研究取徑上除吸收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學習其治學態度之外，也具有自身的一些特點，或可提出就教於方家，謹述如下：

一、運用圖象資料補充文字史料之不足，解決以往

較難處理的議題。例如〈後赤壁賦〉中，東坡倦游歸家，所夢道士是一位還是兩位？道士的人數是一是二雖然皆能解釋，且無礙於〈後赤壁賦〉全篇之宏旨，却影響了其內容的深度，筆者考核東坡文集的版本，元代趙孟頫書〈後赤壁賦〉的法書，以及收錄〈後赤壁賦〉的典籍，發現似乎以“二道士”較為可能。但是“二道士”如何化為“孤鶴”，此數字之不齊困擾著學者的認知，筆者從現存時代最接近東坡的宋代喬仲常“後赤壁賦圖卷”得到詮釋的意蘊。又如傳說舉行於元祐年間於東坡友人王詵家的“西園雅集”，聚集了當時文化界的菁英和釋道名人，歷代皆有新作的“西園雅集圖”及其題畫詩不斷賦詠此椿文藝高會，然而文獻上並無可靠的記載，故而有學者懷疑“西園雅集”全為後人杜撰。筆者搜集了多方的材料與相關畫作，嘗試為之考察。

二、融會西方文學理論重讀東坡作品。東坡繼歐陽修的〈六一居士傳〉作〈書六一居士傳後〉，〈書六一居士傳後〉儘管為歐陽修原作之續寫，思想內容却各有千秋，甚至對於歐陽修的原作，東坡也有獨到的體認，或許與〈六一居士傳〉齟齬，用“讀者反應理論”的角度看來，倒別有興味。

三、從接受史的側面觀察東坡文藝思想的流布。例如蘇轍的〈韓幹三馬〉詩分別有東坡等多人次韻唱和，關於杜甫指稱韓幹“畫肉不畫骨”的觀點，唐代以來屢

見爭論，蘇轍雖然是寫作〈韓幹三馬〉題畫詩的第一位詩人，其餘的唱和者却都於審美判斷上與東坡同調，足見其影響力。至於其繪畫理念影響最為透徹的則非《宣和畫譜》莫屬，《宣和畫譜》為中國第一部官家收藏著錄，其中沒有收藏東坡的畫作，也絲毫未提東坡之名，字裡行間却充滿了東坡的繪畫觀。《宣和畫譜》的作者（或作者群）為何甘冒元祐黨禁之諱而襲用東坡的意見？曾經徽宗御覽的《宣和畫譜》如何在徽宗的默許之下悄悄傳承東坡的思想？筆者皆有追索。

四、東坡研究史的回顧與前瞻。本書收錄的〈蘇軾書畫研究史略〉與〈近五十年（1949—1999）臺港蘇軾研究概述〉為與曾棗莊教授等六位學者合著之《蘇軾研究史》（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2001年）之部份章節。《蘇軾研究史》由海峽兩岸及美國、日本、韓國的學者共同執筆，是為紀念東坡逝世九百年之獻禮，筆者忝列其中，與有榮焉。為顧及《蘇軾研究史》全書規模及整體篇幅，兩篇文章略有濃縮。本書收錄的是較為齊全的內容，並且附錄〈臺港蘇軾研究論著目錄（1949—1999）〉，將筆者多年蒐集資料的結果與同好分享，為蘇軾研究略盡綿薄之力。

為方便讀者檢閱，本書皆註明資料來源以及可考的作者生卒年，重覆出現時則不再贅述。

本書之寫作期間，承蒙筆者兩位博士論文導師——

臺灣大學中文系曾永義教授，以及臺灣故宮博物院副院長石守謙教授指導，世新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黃啓方教授、臺灣大學中文系張健教授、何寄澎教授、成功大學中文系張高評教授等多位師長賜正，方得完成，特此致謝。論文大多經審查通過後發表於期刊中，今再次修訂，集結成書，對於論文之匿名審查人所給予的評語和建議以及中華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的經費資助，亦由衷感激。

本書經曾棗莊教授鼓勵促成，北京綫裝書局欣然同意出版，謹致謝忱。

衣若芬書於臺北，2001年4月

談蘇軾〈後赤壁賦〉中所夢道士人數之問題

一 前 言

蘇軾（1037—1101）的〈前赤壁賦〉以及〈後赤壁賦〉是兩篇傳頌千古膾炙人口的佳構，歷來關於這兩篇作品的賞析和討論不勝枚舉，然而在〈後赤壁賦〉中有一個小問題一直鮮見學者探究，即是東坡所夢道士到底是一位還是兩位？

今人所常見的東坡文集或選集皆錄〈後赤壁賦〉云：

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元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翩躚，過臨皋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以前逢孤鶴橫江，呼應後遇一道士入夢，呈現顯而

易見的實虛對比，這似乎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另有其他的版本却作“夢二道士，羽衣翩仙……”，以“二道士”對“孤鶴”，則文意便不如前一說明晰，因此往往被忽略甚或不採用。

既然有“夢二道士”的版本出現，則其中當必有真訛需要澄清：“一”與“二”是否為傳鈔不慎之誤？還是後人於編錄東坡文集時作了個人的取捨？如果“夢一道士”為真，則孤鶴化為一道士入坡公之睡夢，使得東坡興起“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之間便不難理解；相反地，若是“夢二道士”為真，那麼我們應該如何解釋道士與孤鶴的關係？

本文擬就東坡文集的版本和南宋呂祖謙（1137—1181）編選的《皇朝文鑑》東坡文部份，配合現存後人關於〈後赤壁賦〉的書畫圖版資料著手考察，希望能辨析道士之人數，並進而推測道士與孤鶴二者的關係。^[1]

二 從東坡文集之版本及《皇朝文鑑》選文考察

根據蘇轍（1039—1112）〈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提到的東坡著作云：“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公詩本似李、杜，晚喜陶淵明，追和之者幾遍，凡四

卷。”^[2]前五集加上和陶詩，即是“東坡六集”，乃東坡生前整理編定的詩文全集。

北宋末年蘇軾詩文集被禁毀，南宋弛禁後的東坡全集內容略有變更，晁公武（紹興二年 1132 進士）《郡齋讀書志》卷四下著錄云：“蘇子瞻〈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詩〉四卷、〈應詔集〉十卷。”^[3]是爲“東坡七集”。

我們今日所能見到刊刻最古、保存較完整的“東坡七集”是明成化本。在明初，宋版的“東坡七集”已經罕見，明仁宗曾於洪熙元年（1425）命工翻刻內閣所藏大蘇文全集，可惜“工未畢而上升遐矣”。明成化本《蘇文忠公全集》卷首李紹序云此本乃明憲宗成化四年（1468）吉安知府程宗根據“宋時曹訓所刻舊本及仁廟所刻未完新本重加校閱，仍依舊本卷帙，舊本無而新本有者，則爲〈續集〉並刻之”。其中〈東坡集〉卷十九〈後赤壁賦〉即作“夢二道士”。（見附圖 1）

此後明世宗嘉靖十三年（1534）江西布政司重刊成化本《蘇文忠公全集》，並重編〈續集〉部份。清德宗光緒三十四年（1908）至宣統元年（1909）寶華盦影刊明成化本，由繆荃孫撰寫校記，現所通行的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即是根據繆校本而來，因此“七集”系統的〈後赤壁賦〉皆作“夢二道士”。

除了分集編輯的本子，東坡文集還有分類編輯本，現存最早的分類編輯本，是南宋光宗紹熙二年（1191）郎曄表進的《經進東坡文集事略》，臺北中央圖書館收有此書存五十五卷，已製成微卷。其中卷一〈後赤壁賦〉則作“夢一道士”，郎曄註云：“諸本多云夢二道士，二當作一，疑傳寫之誤。”（見附圖2）同時徵引《苕溪漁隱叢話》證明此說。按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十八云：“此賦初言‘適有孤鶴，橫江東來’，中言‘夢二道士，羽衣翩躚’，末言‘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前後皆言孤鶴，則道士不應言二矣。余嘗見陸遠畫赤壁二賦，因以此詰之，渠爲之閻筆。”^[4]同樣的意見也見於《朱子語類》卷130：“碑本〈後赤壁賦〉夢二道士，二當作一，疑筆誤也。”^[5]

在宋人文章的選集方面，如呂祖謙於南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奉敕編成的《皇朝文鑑》（明代時更名爲《宋文鑑》），其卷五收東坡〈後赤壁賦〉，文中亦作“夢一道士”（見附圖3）。《皇朝文鑑》編成的年代早於郎曄編註的《經進東坡文集事略》，更早於明成化本《蘇文忠公全集》，既然該書作“夢一道士”，是否即爲東坡原文？

呂祖謙於《皇朝文鑑》卷首云：“竊見〈文海〉元係書坊一時刊行，去取未精，名賢高文大冊尚多遺落，遂具劄子，乞一就增損，仍斷自中興以前銓次，庶幾可

以行遠。”可知該書之編輯乃基於對當時江鈚所編《聖宋文海》的不滿。至於其選文所依據的版本，呂文云：“祖謙尋將祕書省集庫所藏本朝諸家文集，及於士大夫家宛轉假借，旁採傳記它書”，因此《皇朝文鑑》的編選和刊刻應當是很謹慎的。然而據《四庫全書·宋文鑑》提要記載，呂祖謙編選本一出，“又稱有近臣密啓所載臣寮奏議有詆及祖宗政事者，不可示後世，乃命直院崔敦詩更定，增損去留凡數十篇”，而且明代商輅（1414—1486）於重新翻刻的《宋文鑑》序（作於英宗天順八年，1464）云：“當時臨安府及書坊皆有刻版，歲久散佚，其書傳於今者甚鮮”，則今日所見之本未必即呂祖謙原本。四庫提要又引商輅序所謂“當時臨安府及書坊皆有版”，認為與李心傳（1166—1243）《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不合，而推測“蓋官未刻而後來坊間私刻之故”，所以能不能以《皇朝文鑑》為準而否定“夢二道士”的說法仍有待商榷。^[6]

回到郎曄編註的《經進東坡文集事略》來談，郎氏編註此書的用意是在於進呈，所依據的應該也是比較可取的版本^[7]。再從其註文的語氣判斷，當時郎氏看見的諸多本子仍是作“二道士”，儘管《苕溪漁隱叢話》提到的畫家陸遠的生平資料與畫蹟皆已不存，但是假使僅僅是偶然一時不慎的傳寫疏忽，怎會形成郎氏所搜羅到的“諸本”、陸遠所根據的東坡文、以及朱子所見的

“碑本”皆恰巧都犯了同樣的錯誤？故而“二道士”的說法不該因為難以與“孤鶴”相對應而率然被捨棄。

由於從現存的東坡文集的版本和《皇朝文鑑》的選文尚未能斷定“二道士”與“一道士”何者為是，本文嘗試從後人的書畫資料著手進一步探究。

三 從後人書畫資料考察

東坡生前曾於神宗元豐六年（1083）親筆書〈前赤壁賦〉予傅堯俞（欽之）（1024—1091），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該書題款云：“軾去歲作此賦，未嘗輕出以示人，見者蓋一二人而已。欽之有使至，求近文，遂親書以寄。……又有〈後赤壁賦〉，筆倦未能寫，當俟後信，軾白。”^[8]東坡是否曾再親筆書〈後赤壁賦〉我們不得而知，至少在現存的書畫著錄裡未能發現，所以只好借助後人的書畫作品。

關於〈後赤壁賦〉的描繪，現存最早的作品為北宋喬仲常（活躍於1125年前後）“後赤壁賦圖卷”，藏於美國密蘇里州堪薩斯城的納爾遜·艾金斯博物館（The Nelson Gallery of Art Atkins Museum），為1980年從紐約私人收藏家顧洛夫（John M. Crawford）處購得。此圖為水墨不著色手卷，高29.5公分，長560公分，分作八個景，

每景之上皆題賦之辭語內容，顯得段落明晰。值得注意的是第八景畫東坡側卧榻上，榻前是夢境中景象：東坡與二客（道士？）對坐，畫面下方書：“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二道士，羽衣翩儻……。”（見附圖4）

鄧椿《畫繼》（序約於南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卷四云：

喬仲常，河中人。工雜畫，師龍眠。圍城中思歸，一日作“河中圖”贈邵澤民侍郎，至今藏其家。又有“龍宮散齋”手軸、“山居羅漢”、“淵明聽松風”、“李白捉月”、“玄真子西塞山”、“列子御風”等圖傳於世。^[9]

夏文彥《圖繪寶鑑》（序於元順帝至正二十五年，1365）卷三亦云：“喬仲常，河中人。工雜畫，人物師李伯時。”^[10]以李公麟（字伯時，號龍眠山人，約1049—1106）與東坡的交誼^[11]判斷，應該看過東坡的〈後赤壁賦〉，喬仲常師李公麟，年代又與東坡賦成之年（元豐五年，1082）相去不遠，可能所讀的〈後赤壁賦〉較近於東坡原文。可惜宋人的文獻中並未提及喬仲常曾經畫過“後赤壁賦圖卷”，如周密（約1232—1308年前後）《雲煙過眼錄》卷上記載喬仲常“有‘蘭亭圖’、‘高僧誦經’”，樓鑰（1137—1213）《攻媿集》卷七十一有〈跋

喬仲常高僧誦經圖》云：“始余從鄉僧子恂得羅漢摹本，舊有跋云：姚仲常善畫而不易得，一貴人待之三年，一日欣然索匹紙，爲作寫真，數日而成。……”樓氏認爲此“姚仲常”即是“喬仲常”，蓋當時人“見國朝畫則指爲龍眠，亦不知有喬君也。”^[12]可見喬氏畫名爲龍眠所掩，故而未見諸著錄。

直到清乾隆《石渠寶笈》初編纔見登錄“宋喬仲常後赤壁賦圖一卷……貯御書房”，並云：“素箋本，墨畫，分段楷書本文，無款，姓名見跋中。卷中幅押縫有‘醉鄉居士’、‘梁師成美齋印’、‘梁師成千古堂’、‘永昌齋’、‘漢伯鸞裔’、‘伯鸞氏’……諸印。前隔水有‘梁清標印’、‘蕉林鑑定’二印，押縫有‘棠村’、‘觀其大略’二印。後隔水押縫有‘蕉林梁氏書畫之印’、‘蕉林書屋’二印。”^[13]

按梁師成爲宋徽宗時宦者，《宋史》卷四六八有傳云：“字守道，慧黠習文法，稍知書。……師成實不能文，而高自標榜，自言蘇軾出子。是時，天下禁誦軾文，其尺牘在人間者皆毀去，師成訴於帝曰：‘先臣何罪？’自是，軾之文乃稍出。以翰墨爲己任，……多置書畫卷軸於外舍，邀賓客縱觀，得其題識合意者，輒密加汲引，執政、侍從可階而升。”^[14]由梁師成對東坡文之留心，以及對書畫之喜好判斷，收藏有此幅作品是有可能的。而“伯鸞氏”乃東漢人梁鴻，《後漢書》卷八十

三本傳云：“扶風平陵人，家貧而尚節，博覽無不通。妻孟光貌醜而賢，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漢伯鸞裔”的印章顯示該圖為梁氏擁有，但不知是指梁師成或是梁清標。至於梁清標（1620—1691），字玉立，號蕉林，一號棠村，明崇禎十六年（1643）進士，官至清保和殿大學士，著有《蕉林詩文集》、《棠村詞》等，因此可知“後赤壁賦圖卷”上的許多印章都說明了這幅畫曾經被梁清標珍藏。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圖卷拖尾有趙德麟（1061—1134）寫於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的跋語：“觀東坡公賦赤壁，一如自黃泥坂游赤壁之下，聽誦其賦，真杜子美所謂‘及茲煩見示，滿目一淒惻。悲風生微絃，萬里起古色’者也。宣和五年八月七日德麟題。”趙德麟為燕懿王玄孫，早以才敏聞，蘇軾為潁州守時曾因愛其才而薦於朝，宣仁太后以其德行不良而不許，後曾被科罰金，《宋史》卷二四四有傳。東坡曾作〈秋陽賦〉、〈趙德麟餞飲湖上舟中對月〉等詩文贈之，可見兩人交情。如果趙德麟看到的〈後赤壁賦〉原文非“夢二道士”，應當會對畫面的構圖安排表示意見，既然沒有，則畫家的創作絕不是毫無依據的。此外，這一段題跋的時間也幫助我們推算出“後赤壁賦圖卷”的製成年代：約在元豐六年（1083）至宣和五年（1123）之間，與東坡的時代十分接近。